

巴达维文化中的华人文化(一)

大卫·柯建豪(DAVID KWA KIAN HAUW)

早在荷兰人到来以前,华人就已经来到爪哇北部沿海地区,特别是西爪哇。17世纪,华人在万丹(Banten)和巽他格拉巴(Sunda Kelapa)就已妇孺皆知。

后来,巽他格拉巴更名为巴达维亚(Batavia),托梅·皮雷斯(Tomé Pires)称其为巽他王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。当荷兰人第一次踏足巽他格拉巴的时候,他们发现华人已定居在芝利翁(Ciliwung)河口东岸地区。

有趣的是,在闽南语中,华人至今仍称这座城市为“吧城”(Pa-si)。这个名字是从“格拉巴”(Kelapa)的闽南语音译“咬留吧”(Ka-lu-pa)得来(Douglas, 1899:353),在汉语中,它又被称作“椰城”(Yéchéng),意为“椰子之城”。这两个名字都是由城市的旧称“巽他格拉巴”音译而来(Salmon dan Lombard, 1980: xxi)。

1619年,巽他格拉巴的商业中心被

烧毁后,巴达维亚城就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来。为了解决人口不足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,荷属东印度公司(Kongsi Dagang Hindia Timur, VOC)没有招纳马打兰(Mataram)王国的巽他人和爪哇人,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欠佳(爪哇人于1628年和1629年两次袭击巴达维亚)。因此,东印度公司从外岛如:布吉斯(Bugis)、望加锡(Makassar)、峇厘(Bali)、安汶(Ambon)、班达(Banda)迁移进一些族群,

特别是华人。随后,城市创立者燕·彼得逊·昆(Jan Pieterszoon Coen)开始有序地实施流放和移民政策。17世纪,印度公司千方百计招揽各地华人到巴达维亚定居。可以说,巴达维亚是由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建立起来的。

此外,华人还在这座城市的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各行各业均可见到华人的身影,如粮食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商业、手工业,还有砂糖和

制酒业。18世纪初期的25年里,巴达维亚附近向西的种植园和糖厂得到了迅猛的发展,而华人制造的巴达维亚酒更是蜚声海外。

上述事实表明,华人与后来被称为巴达维的族群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。这种关系由来已久,远远早于西方民族来到努山达拉群岛的时间。

语言的影响

最初前往爪哇的华人大多来自闽南(Bân-lâm)地区。闽南,指的是位于福建省南部的漳州(Ciangciu)、厦门(Emui)和泉州(Cuanciu)及附近地区。因此,巴达维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多来自闽南文化,而非中国其它地区。一些闽南语词汇至今仍在使用,有些甚至还融入巴达维——马来语词汇中,这些现象都是有利的佐证。

1865年,一位来自梭罗(Surakarta)的旅行家拉登·阿里约·萨斯特洛达莫(Raden Aryo Sastrodarmo)抵达巴达维亚。

赛迪(Saidi)摘录(2004:115)他的作品《巴达维族的情况》(Kawontenaning Nagari Betawi)道:“……巴达维族人的习俗和华人习俗很相似。巴达维族人的自我介绍方式也很像华人,他们的坐姿和谈话的方式也和华人如出一辙,都是坐在椅子上,吃饭的时候会用地板的席子上。巴达维人还从华人那里学习武术。巴达维人无所畏惧的精神也受到华人的影响”

而在爪哇,土生华人也受到了爪哇文化的熏染。从很早的时候开始,他们当中就有不少人已经称得上是爪哇文化的专家(爪哇甘美兰音乐、爪哇舞蹈、真人哇扬戏、皮影戏、蜡染、格里斯短剑等等)。因此,据我观察,雅加达的文化互动——即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——十分强烈。

一方面,华人族群,特别是土生华人,深受巴达维文化的影响。另一方面,巴达维族文化

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。两个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如此密切,以至于我的一位巴达维族密友开玩笑道:“巴达维族人和华人唇齿相依。”

下面列举一些源自中文的巴达维语词汇,这些词汇来源于闽南语的漳州方言,而非普通话。笔者按照字典常用的发音系统,在括号里注出了这些词汇原来的发音(Douglas, 1899)。

在具有开放性的巴达维语中,我们发现了许多中文借词(Loanwords),特别是来自于闽南语(Bân-lâm-gi)的漳州方言。其中,有人称代词gua(go á 我):“我”,和lu(ú 汝):“你”;简单的数量词gotun(gò o-tú n 五盾):“五盾”,captun(chap-tú n 十盾):“十盾”,cepéh(chit-pah 百):“一百(盾)”,gopéh(gā o-pah 五百):“五百(盾)”,secéng(chit-chheng 一千):“一千(盾)”,gocéng(gā o-chheng 五千):“五千(盾)”,ceban(chit-bā n 万):“一万(